

寻觅偶记

王凤胜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寻觅偶记

王凤胜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寻觅偶记

王凤胜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4 插页 285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9-1696-0
I·1458 定价 15.60 元

序

徐传武

凤胜同志编定了文集《寻觅偶记》，要我写个序。为名人作序更需名人，我说不敢当，并推荐了两位有名望的师长。他说，我们是老同学了，比较熟悉，还是你来写吧。我推辞再三，未获允准，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勉为其难了。

中国崇尚的文人，应当是既有“文章”，又有“道德”者，故有“文章道德太史公”、“文章道德圣人家”之誉，凤胜同志可以说是“文章”、“道德”皆令人钦敬之人。我和凤胜同志是大学里的同学，不但是同班，而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同组。凤胜同志当过我们的组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他心胸坦荡，为人厚道，遇事总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处理事情公正、允当，甚得广大同学的拥戴。有人说，只要放到某某领导岗位上，谁都能干！干或者也能干，但干好委实不是易事。君不见，有些一二十人的小单位的领导，结党营私，拉此打彼，两面三刀，劲也没少用，却总是矛盾重重，业绩甚微。人常讥讽某些领导是“不学无术”，岂不知单是“不学无术”还算是好的，更可怕的是那些“不学有术”的小头头，但这“术”不是指学术、技术，而是整人术、害人术、捣鬼术、挑

拨是非术。在这种人的把持下，怎么会有一个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让人能安心工作？每回忆起和凤胜同志相处的日子，总让人有种十分欣慰的感觉。我觉得凤胜同志的确是有较为超卓的领导艺术的，而其根基就是能团结人，不自私自利。有语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凤胜同志可以当之矣。凤胜同志还是位很重感情、很重友情的人，他在本书《后记》中提到的衣丽华同学，病重后不愿见熟人，凤胜同志却多次去看望她，她激动得常常流泪。凤胜同志当了省委讲师团团长、当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每出发到外地，抽空总要去看看当地的老同学，而我们这些老同学有不少是在基层工作或乡镇中学里教书的，能见到凤胜同志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在大学里给我们讲现代文学课的是孙昌熙先生，凤胜同志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还常去看望他，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孙先生自豪地说，我有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王凤胜，一个是王湛。孙先生病重住院，凤胜同志让我打听了他住在哪个医院哪个病房，马上去看望了他，弥留之际的孙先生见了凤胜同志非常动情。想不到第二天孙先生就去世了，连我们在山大的几位同学约好了去看望他都未来得及。可见凤胜同志对师长、对朋友、对同志的确有一颗赤诚的、友善的心。人们说，在群雄逐鹿的年代，得人心者得天下。我认为，在和平环境里，要真正当个“好官”，对于人心的向背也是不可漠然视之的。

凤胜同志擅长为文，字也写得好。上大学时我们班的黑板报，下乡时办的小报，有许多都出自他的手。他写的学习鲁迅的文章，受到当时任教的孙昌熙先生的称许。他是我们班第一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临近毕业时，正上演现代京剧《红云岗》，《大众日报》、《文史哲》编辑部曾先后向我们约稿。当时以王凤胜、衣丽华和我的名义合写的两篇评论《红云岗》

的文章，其实都是凤胜同志执笔写成的，我和衣丽华仅是挂名而已。我当时很愿意参加此写稿之事，主要是想向凤胜同志学习写文章。虽然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有作文课，但直到上大学时我仍感到这方面还差得很多。虽有古今许多大家的文章可作范例，但看看身边人的写作似乎感到更亲切、更有效，进步也更快。凤胜同志在写作中善于发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在材料的处理、观点的表述、章节的安排等方面，那时已显得身手不凡。我们临近毕业时，中文系领导还让他给下一届同学介绍写作的经验和体会，同学们反映颇好。大学毕业后，凤胜同志回到了原来的部队，后转业到省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编辑、研究工作，再后来又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走向世界》杂志总编辑、省委讲师团团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在这十分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坚持笔耕不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去主编、合著的数种书之外，他还撰有文艺研究论集《思絮集》（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出版）、撰有研究周恩来文艺思想的专著《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再加上这部《寻觅偶记》，的确是很可观的了。鲁迅曾说，自己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凤胜同志也是挤时间，特别是挤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写作的。他的《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出版后，反响颇大，山东省作家协会和山东人民出版社等曾联合召开了该书的研讨会，我也应邀忝列其中。我在发言中曾说：“干行政工作的人常常慨叹没工夫做学问、写东西，酒桌舞厅里常见他们的身影，我这位老同学以自己的行动说明即使干行政工作繁忙，也还是能不断地写东西、出成果的，当然，这要付出许多艰辛的劳动。”（见拙著《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下册第1514—151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凤胜同志自己也说，这样做“确实是自找苦、累”，其《周恩来文艺思想新

论》的最后一个专题，就是“在 1994 年的爆竹声声的除夕之夜”完成的，但当看到自己的辛劳结出丰硕果实的时候，自己的“兴奋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所表达的。因为我认定了只有这样做，才有意思，有意义，生活才更充实。”（见王凤胜《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后记》，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他的这些成果，可以说是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用宝贵的心血凝成的。

凤胜同志的这部《寻觅偶记》，我认为可与其《思絮集》、《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合看，或对照着看，这样可以较全面、较详尽地了解他的评论活动，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文艺见解、文艺主张和研究特色，更清晰地体察他 20 多年以来在文艺评论这个园地里辛勤劳作的足迹。这部《寻觅偶记》从写作时间跨度来看，比前两部要长，涉及的面也更宽泛。乍看《寻觅偶记》这个书名，往往认为都是些短论或杂记，其实书中的有些篇章却是学术性很强的宏篇巨制，特别是开首几篇关于周恩来文艺思想的论述。其《周恩来文艺思想重要理论观点阐释》一文，对周恩来的主要理论观点归纳、整理成“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是生活的反映”、“文艺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文艺要寓教于乐”、“标语口号不是文艺”、“文艺要表现时代精神”、“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艺术形式要统一、和谐、明确、生动”、“有了生活实践，还应该艺术实践”、“文艺作品要有发表、批评、讨论的自由”、“最好是创造典型人物”、“作家要把世界观搞好”、“要敢于写人民内部矛盾”、“民族化就是大众化”、“以我为主，加以溶化”、“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既要有独特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要造成文艺界的民主风气”、“必须进一步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文艺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等等，等等，共有 46 题之多，洋洋四万多言，较为详尽地阐发了周恩来文艺

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对这种观点的来源、形成过程以及当时和当今的现实意义都作了较为准确的论述。其《论周恩来六十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一文，把周恩来“在60年代前期发表的一系列的重要文艺论著”所表现出来的文艺思想，进行了颇为精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了这个时期周恩来文艺思想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认为这时期的周恩来文艺思想，“在总结和探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凤胜同志最后总结说：“周恩来在60年代前期这个特定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文艺思想，无疑有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和巨大的理论价值。用历史的、比较的、全方位的眼光加以审视和评判，更感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杰出贡献，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历史意义。”凤胜同志进一步解释说：“周恩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其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文艺方面虽然在建国以后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但由于50年代后期以后指导思想的失误，因此在60年代前期理论建树不多。恰恰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文艺思想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和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从而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东西，捍卫了毛泽东正确的文艺观点，又对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失误做了最大限度的抵制和纠正，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主张。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又一个大放光彩、再度辉煌的时期。”凤胜同志通过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是比较明显地、也是重点地继承了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因而结论说：“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和

桥梁作用，即直接承前和继往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启后和开来于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连结 50 年代后期以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伟大桥梁和闪光纽带。”这种分析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的，这种结论则表现了一个理论家的创新勇气和卓越见识。其《近二十年周恩来文艺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一文，对近二十年以来周恩来文艺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对研究中论及的主要问题从“总体性研究”、“基本理论研究”、“文艺实践研究”等诸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宏观研究要加强”、“专题研究要拓展”、“研究队伍要壮大”、“研究资料要充实”等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只有对周恩来文艺思想研究得比较深透，对周恩来文艺思想各种研究状况掌握得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人才能说到点子上，这对于周恩来文艺思想的研究无疑是有重大指导作用的见解。凤胜同志的这些论述，我认为可以看作是其《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之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与以上情况类似的，还有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评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中、文化生活中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指导作用的问题，有些人是有怀疑的。凤胜同志在《用〈讲话〉的基本精神指导新的文艺实践》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在 90 年代的今天，《讲话》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指针。这就是说，在新的文艺实践中，要运用《讲话》的基本精神来分析、研究和解决文艺问题，从而保证党的文艺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他在《重学〈讲话〉断想》中也说：“《讲话》历经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反复证明它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没有随着岁月

的流逝而‘过时’，而是长青的，永存的，充满着活力的。”凤胜同志还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期还要发展，其结果就是邓小平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思想能否成为一个体系？凤胜同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创新》一文中认为：“邓小平一直重视、关心、支持文艺工作，并有过许多论述，但其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特别是他在1979年10月30日发表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文，是展示其文艺思想体系形成、全面创新的重要标志，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发展、繁荣的伟大宣言和行动纲领。邓小平关于文艺的一系列创新性论述，是与新时期面临的大环境、大变革、大潮流密不可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运用、丰富和发展。”凤胜同志从八个方面详细论述了邓小平文艺思想“创新”的贡献：一、立足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应走的道路作出新的论断；二、坚持全面协调发展的原则，对社会主义文艺给以新的科学定位；三、努力拓宽服务范围，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方向；四、大胆调整文艺政策，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注入新的内容；五、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要，对文艺功能问题作了新的阐述；六、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梳理出文艺上开展反倾向斗争的新思路；七、正确认识文艺作品的特殊属性，及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发展面临着新的课题；八、切实把握文艺特点，把尊重文艺规律、尊重文艺家创造性劳动的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凤胜同志还总结出了邓小平文艺思想三大特点：一是着眼大局的整体意识；二是求是求新的思想观念；三是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凤胜同志认为：“这三个方面，紧密相联，既是支撑邓小平文艺思想大厦的三大基点，也是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独到

的新颖性高度统一的内在因素和前提条件。”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文艺反映时代精神的几个问题》一文。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应该成为主旋律。”凤胜同志在文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肯定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把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既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90年代党、人民、时代向广大文艺家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凤胜同志还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如何正确地认识、理解时代精神和如何准确地把握与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凤胜同志的这些论述都是关系到文艺工作要解决的根本方针大计，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凤胜同志在省委宣传部多年以来都是从事、分管文艺工作的，对这些问题都理解得比较深透，看得比较高远，论述起来也有一种高屋建瓴之势。他虽自谦为是“寻觅”中“偶记”而成，其实论述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我认为应是他倾注心血的“力作”。

凤胜同志的《热情·介入·深化》一文，是呼唤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身于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深入生活二议》一文，是论述作家要深入生活的，文中重点论述了深入生活“贵在自觉、持久”，并认为此事不单单是作家自己的事，还需要各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挂钩”的联想》一文，是论述党中央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两个“挂钩”（即：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挂钩，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挂钩）的希望和要求的，论述了两个“挂钩”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和文艺工作者如何做好“挂钩”的问题。《谈活跃和发展文艺评论》一文，是针对山东省的文艺评论工作还“不够活跃”，

文艺评论工作还需有较大发展的现状而言的，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文学评论要新、深、活》一文，是针对一些文艺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某些不足之处而言的，为了提高评论的质量，“要力求做到新、深、活”，具体地说：“新，就是新颖：观点要新，内容要新，角度要新，阐发过去众所周知的文艺问题要有新的见解，论述当今文坛上的文艺现象要有新的发现。深，就是深刻：分析、研究问题不要浮在表层，浅尝辄止，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讨，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活，就是活泼：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艺术随笔、作品评介，都不要忘掉‘文学’二字，要有点文采，行文要不拘一格，形式要多种多样。”《繁荣山东文艺创作之我见》一文，论述了全省文艺创作的成绩和不足，分析了问题存在的“潜在因素”，提出了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作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使山东的文艺创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更上一层楼”的具体措施。《写在首届山东艺术节圆满结束之时》一文，对首届山东艺术节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的一些方面。《关于繁荣音乐舞蹈艺术的思考》一文，对于山东省音乐舞蹈艺术园地里的成就和不足，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论述，并提出了如何使之更加繁荣的设想。《文艺急需更多的尖子人才》一文，论述了造就和培养更多的“一流水平的文艺人才”“是实现山东省文艺大繁荣的关键”。以上数篇，虽然主要是针对山东省文艺界的状况而言，但也很有普遍性，对于全国的文艺事业某些“弊端”也有针砭之效。《漫谈文艺界的团结问题》一文，论述了文艺界在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各个方面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的措施。《文艺家也要去创造良好气氛》一文，指出了创造良好气氛不单是各级领导的事情，也是文艺家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要“自觉地为形成这种良好

气氛贡献力量”。《要重视对文艺青年的思想教育》一文，在肯定文艺青年的思想状况主流是好的以外，也指出了存在着的种种不足和薄弱方面，认为“各级文艺领导部门应把培养教育文艺青年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指出了在抓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以上诸问题，都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很有现实意义。《谈谈误会与巧合》是论述文艺创作中常用的“误会”与“巧合”这两个艺术手法的，指出只有正确地运用这两个艺术手法，才能产生较强的艺术效果。《有感于秦牧对约稿者的希望》是认同秦牧提出的不要把“约稿集中在少数作家身上”的希望而写的，指出约稿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不利于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也影响老作家的作品质量和身体健康，报刊约稿时应当引起注意。《也谈“鲁迅的本来面貌”》是针对有的人把鲁迅仅仅当成一个作家来看待，从而否定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偏颇而发的。这几篇倒真有点因“寻觅”而“偶记”的味道，所论所述自然不如前面所说的篇章意义重大，但亦自有其真知灼见的亮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还是值得一读的。

本书第二辑是凤胜同志撰写的作品评介文章的汇编。《指导文化艺术建设的重要文献》是评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文化文选》一书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力作》是评介李衍柱、李戎合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一书的，《富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是评介李衍柱主编的《文艺学范畴论》一书的；《漫评〈天安门诗抄〉》、《〈喜盈门〉的创作特色及其启示意义》、《〈红柳绿柳〉：从舞台到银幕》、《吕剧〈张王李赵〉观后琐语》等，是分别评介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抄》、山东作家辛显令编剧的影片《喜盈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张彭等编剧的莱芜梆子《红柳绿柳》、青岛市吕剧团演出的吕剧《张王李赵》（赵象焜编剧）等文艺作品的；《一幅新

的八仙图》是评介刘钰民的长篇神话小说《八仙东游记》的，《令人担忧的“廖国荣现象”》是王尚贤的中篇小说《呵，曼陀罗》的读后感，《“龙的传人”在觉醒》是熊尚志的中篇小说《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的读后联想，《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典型形象》是论述现代京剧《红云岗》中英嫂形象塑造的，《一把铁锹见深情》是赏析现代京剧影片《平原作战》的细节描写的；《推荐一部优秀大型图书》是评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大型图书《人民总理周恩来》的，《从政者的有益借鉴》是读李瑞环倡编并为之作序的《从政史鉴》的。这些作品评介都比较实事求是，好处说好，不足之处也善意地指出来。这些作品评介，或写于70年代，或作于90年代，经历了漫长的20多年，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凤胜同志文艺评论的成长过程。凤胜同志在评介这些作品时，很注意对其现实意义予以揭示，《天安门诗抄》在揭批“四人帮”，怀念周总理的热潮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就不说了，《令人担忧的“廖国荣现象”》对于小说中先进典型被无端“嫉妒、猜疑、讽刺、挖苦、造谣、报复等”，凤胜同志认为这是“我们民族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现实生活中还颇有一定市场的自私性、守旧性、内耗性等的一种深刻反映”，小说予以揭露、鞭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凤胜同志在读了《从政史鉴》一书后说：“要想保持我国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稳步发展，要想更好地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还需要借鉴历史上的有益经验。因此，提倡懂得一点从政史，不仅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迫切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总结和丰富党和国家执政、从政经验，提高广大从政者的从政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政学的迫切需要。”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我认为也是符合《从政史鉴》编撰者的初衷的。在凤胜同志所评介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山东籍的作家或与山东有关系的作品的（在凤胜同志的《思絮集》中

亦有不少这类的作品评介，可以参看），他对山东省的作家、作品可以说是“一往有情深”的。凤胜同志是河南邓州市人，他对故乡是很怀念的，但近30年来一直在山东参军、上大学、工作，对山东也是很有感情的，山东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我从他的言谈和文学理论、作品评介中似乎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

本书第三辑是凤胜同志撰写的一些纪实性游记、散文。《香港演出见闻录》、《香港出版界掠影》、《追忆方荣翔的香港之行》3篇，写的是出访香港的文化活动；《初识哈巴罗夫斯克》、《在圣彼得堡寻觅》、《莫斯科的自由市场》、《俄罗斯人的公德意识》4篇，写的是出访俄罗斯时的见闻；《马六甲的中国风》、《新加坡印象》2篇，写的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时游览的观感；《曼谷一瞥》、《泰国的新奇表演》2篇，写的是在泰国参观时的印象。这些异地他邦的游记，可以开阔人的眼界，增加人们的见识；读读这些游记，可以得到一种美的享受，不但让人领略那些美的自然风貌、美的人文景观，而且让人欣赏到那些民族和人民的美的传统、美的心灵；凤胜同志在着意介绍这些“他山之石”时，也很注意用它们来攻制我们事业之“玉”。香港出版界的情形，可作为我们内地出版业的借鉴。哈巴罗夫斯克城的革命遗存物，说明列宁精神的影响犹在，天不能死地难埋，列宁精神将来或者会有化成新的形式重新大放光芒的一天。圣彼得堡浓厚的文化氛围，令所有游览者叹为观止，受圣彼得堡艺术之城、冬宫艺术之宫长期艺术熏陶的俄罗斯人民，在世界繁茂的艺术之林里，总应当有自己卓越的贡献。莫斯科的自由市场，或者也映现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子。凤胜同志引用徐先生的话说：“我有个忧虑，就是我们的一些厂家和个人趁机向俄罗斯‘倒’质量低劣的商品，这样会影响中国商品的信誉。如不引起重视，很有可能将中国商品挤

出俄罗斯市场。这些话启示我们，质量、信誉是中国商品占领国际市场的关键所在。”这些话值得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中国商人深思。俄罗斯人有良好的公德意识，自觉排队，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公共场所环境优雅洁净，爱护公物、文物成风，自觉保护大自然，以鸟兽虫鱼为友等等，值得我们好好效仿。凤胜同志说：“俄罗斯人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公德意识，主要取决于全社会对社会公德的重视和张扬。不管是苏联解体前，还是解体后，政府都很重视对公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公德教育，着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在大中小学校、成人教育和社会宣传舆论中，都始终不渝地坚持进行社会公德教育，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以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为荣的良好氛围。就公民来说，也把通过自身修养增强公德意识作为日常生活以及整个人生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这些方面，的确显示了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值得引起我们的政府、学校、宣传等部门的重视。马六甲的华人刻苦、耐劳、诚实、忠厚，但也有着现代人的精明，这也是处于商品经济时代的国内华人应当汲取的。他们那浓郁的年节景象，如凤胜同志所说的，表露着“中国节庆文化在海外所显示的珍贵性及其强大的渗透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也表露着古老而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习惯是多么的富有生命力，这或者也是世界华人紧密相联的一根纽带。泰国那些各具特色的佛寺、富有诗意的水上市场、美丽如画的海滨和岛屿，的确让人流连忘返。凤胜笔下的泰国北榄的鳄鱼表演，泰国东芭的大象表演，的确是“新颖奇特，颇多情趣”的。对于泰国芭提雅的“人妖表演”，凤胜同志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和评述，我对这种男身女相的“人妖”，属于“贬之、忧之”的一派，见仁见智，只好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吧。

《漫游定林寺》是第三辑的最末一篇，也是全书的最末一篇。中国古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的故乡在山东莒县，当年

的刘勰曾在京口（南京市城外）定林寺居住并写作了文论巨著《文心雕龙》，故乡人民为纪念刘勰在莒县又建筑了定林寺，这里现在还辟有“刘勰纪念馆”。作为搞文艺理论的风胜同志来说，将这篇怀念刘勰的游记置于全书之末，我认为似乎有意无意的有点“崇祖”的味道。刘勰的《文心雕龙》，被人称为“龙学”，正在冲出中国，走向世界，我们的文艺理论要显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我认为除了汲取西方理论的营养之外，还应该更多地从刘勰等人身上汲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精髓。

我和风胜同志相识，已有二十六七年之久了。风胜同志已近“知天命”之年，这个年龄是人生非常成熟的时期：知识积累丰富，经验教训丰富，胆量、眼光、头脑，都正处于非常优化的状态，所以我祝愿他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在文艺理论的钻研和写作上，还是在具体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中，都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风胜同志要我写序时，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夸大，不要溢美，不要说过头话。以上提到的事实，都是真实可信的；至于我发的议论、感想，也是我真实思想的流露，如有不合理、不准确之处，乃是我水平不及所致，但决非什么故意的夸饰。

近日“二竖”猖獗，虐我甚苦，呜呼！其惨苦有不忍言于前者。幸得风胜同志送来此书稿一阅，使我疼痛的身心渐生宽松之感矣……

1998年12月28日于山东大学南园